

论宋子文的对日强硬态度

(1931—1933年)

吴景平

一般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因对日态度的歧异,逐渐出现了亲日(和日)妥协派与拒日强硬派的对立。汪精卫被认为是亲日妥协派的魁首,宋子文则一般地被视作拒日强硬派的代表。

笔者认为,这样划分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还应该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南京当局内部在对日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并非九一八事变后便立即出现的;汪、宋等人的对日态度,也各有其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评述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热河抗战前后宋子文的对日态度,兼述宋子文与蒋介石、汪精卫等在对日态度上的异同,以冀深化对抗战前国民党对日态度问题的研究。

—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以及事变后的最初几天里,宋子文曾主张中日之间直接进行外交谈判,以防止事态恶化。

1931年夏,东北相继发生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后,时任驻华公使的重光葵曾与宋子文秘密接洽。他们议定共赴大连与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会谈,再由内田来影响东北的日军,使日军保持“克制”。为此,宋子文与重光葵已预订了9月20日从上海北上的船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宋子文仍同意按以前的计划行事,尽快赴满洲寻求解决办法。^①除了重光葵的回忆录之外,日本外交档案和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回忆录,都载有宋子文主张中日

^①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72—73页。

直接交涉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内容。^①

但是，宋子文的态度很快发生了变化。9月21日，重光葵向宋提出，双方不仅就满洲问题而且对日中全局问题进行商谈，宋子文即表示：“满洲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是日军有计划的行动，已经不容插手。中国已于20日向国际联盟直接申诉，此事对日方当局来说已经失掉了时机。”^②9月22日，宋子文又向日本驻南京领事上村伸一指出：“我一直在为解决事态而尽力。但东北事态最近扩大，已经不是我个人所能承担得了。因此，南京方面的大趋势，是向国际联盟提诉解决，我本人也同意了这一方针，昨21日已向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电告上述内容。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我本人也感到很遗憾。”^③除了重光葵和上村伸一这两位当事人的回忆之外，日本外交档案也有宋子文于9月22日撤回中日之间直接交涉方案的记载。^④当时美国驻日本使馆从日本外务省方面得到的印象是：“看来，宋子文曾以个人名义向日本公使提议，成立一个中日委员会调查所发生的事件，日方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后来“宋失去了先前的积极性，他和他的南京同僚们不再支持这一方案”。^⑤上述各种说法可归结如下：在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方针上，宋子文一度想通过中日间的直接交涉来解决，但旋即放弃了这一主张，改为求助国联。

宋子文上述主张的改变，实际上也代表了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曾要求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向国联表明：“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本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

① [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原书房1965年版，第60页；[日]市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原书房1974年版，第173页。

②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72—73页。

③ [日]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第17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版，第336页。

④ [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第60页。

⑤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1年第3卷，华盛顿1964年版，第431页。

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①此外，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的公开讲话、次日国民政府的《告全国国民书》，都表明了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即军事上不抵抗，但外交上决不屈服；不与日本进行直接外交谈判，完全依赖国联的仲裁。

从中日直接交涉转为诉诸国联，宋子文把这个转变的原因归之于日军在东北扩大事态。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也是这样向新闻界解释的。日本军队于9月19日晨占领沈阳，同日又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20余个城市。事态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1928年济南事件的规模、范围，引起南京政府极大震动，使宋子文等不得不怀疑中日直接交涉能否平息事变。但另一方面，当时在华的国联秘书处卫生局长拉西曼也起了较大作用。拉西曼(L. Rajchman)系应国民政府邀请来华，商讨国联对华技术援助问题，他与宋子文的关系甚为密切。日本方面认为，正是在拉西曼的影响下，宋子文乃至南京当局由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转为诉诸国联。^②据顾维钧回忆，拉西曼曾出席国民政府商议处理九一八事变方针的会议，并通过宋子文的翻译向蒋介石提出，中国应该明确拒绝和日本谈判，而依赖国联行政院的决议，要求日本从占领区撤军。^③

宋子文当时受蒋介石的委托负责对日外交，担任了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副会长(会长为戴传贤)。他时常与蒋介石、戴传贤、顾维钧等人商议中国在国联会议上的应对方略。施肇基在国联会议上的各次发言，事先均经过宋子文等人在国内洽商议定。中国虽然已明确表示信赖国联仲裁，但对国联在事变后未能作出制止日本侵略的有力决定，宋子文也是不满的，认为国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1981年版，第321页。

② [日]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第17卷，第336页。

③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7—418页。

联表现得“畏首畏尾”。特别是1931年11月下旬日军向锦州进逼后，包括宋子文在内的国民政府的态度，一度转趋强硬。11月24日，中方得悉国联将派三人委员会到中日冲突现场调查情况，但“对于各方军事行动之监视，不在委员会范围以内”。宋子文与顾维钧等人讨论后，即电令施肇基向国联提出：“一，行政院须以有效之决议制止日军侵略行动。二，日军须在一定期间内完成撤退。三，撤兵须在中立人员观察之下。如行政院不承担此三条责任，该议决案即不接受。”^①宋子文等还向张学良发出指示：请张并饬所属勿与日方直接讨论交涉，应“由中立国观察员转达……以防堕其奸计”；“如日方无理可喻，率队来攻，仍请兄当机立断，即以实力防御”；^②“锦州一隅之保存，关系三省全部存亡；撤兵一节，若无国联或三国确实保证，吾方万不能承允；如日军不顾国联决议，悍然进攻，只能竭力抵御。”^③

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之后，宋子文还曾多次同在华美国外交官进行接洽。宋子文认为，美国虽然不是国联成员，但却是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签字国，中国应争取美国的支持来遏制日本的侵略。他曾向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贝克（W.R. Peck）表示：在日本撤兵之前，中国不会同日本谈判。^④他向美国驻华公使詹森（N.T. Johnson）指出：日本是想把1915年的条约付诸实施；只要日本还占领着中国的城市和其它领土，中国就不会同日本谈判；在当前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就会立即引起民众广泛的强烈反对，这样，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无法维持下去。^⑤宋子文还向美方揭露了日本拒不撤兵的险恶用心，是企图使中方无法有效地控制局势，从而发生某种事件，日本便有借口维持、强化乃至扩

① 顾维钧致张学良电（1931年11月24日），《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② 宋子文顾维钧致张学良电（1931年12月2日），同上。

③ 宋子文顾维钧致张学良电（1931年11月29日），同上。

④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1年第3卷，第104页。

⑤ 同上，第218—219页。

大其军事占领。^①当然，宋子文同美方接触，旨在谋求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他要求贝克转告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内外都受到了重大压力，难以解释西方大国的努力为什么对日本政府不能奏效。中国对美国的要求可归结为一条，即美国政府应率先采取行动，使日本立即、全部地撤兵。^②他要求美国向东京施加压力，使日本履行其撤兵诺言。他向美方提出，美国应根据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相应的措施，他甚至希望美国发起召开另一次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③宋子文还以中国可能倒向苏联一边的暗示，催促美国对中日冲突立即采取明确的立场。他指出，中国人现在普遍表现出对苏联的友好感情，他本人和中国政府对此都感到担忧；当然，为了抵抗日本，中国或者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国联以及九国公约签字国特别是美国的介入，或者依靠苏联政府。^④

应当指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宋子文乃至整个国民政府放弃了同日本直接交涉的方针，使日本侵略东北合法化的企图无法实现，这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在当时的国际环境里，诉诸国联和争取美国的支援，不失为一种必要的外交努力。问题在于，包括宋子文在内的南京政府，没有把外交努力置于组织起坚决有效的军事抵抗的基础之上，过分依赖国际联盟，并对美国寄予了过高的期望。这样，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之下，国民党当局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二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之际，国民政府出现了蒋、汪合作的局面，蒋介石执掌最高军事权力，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内迁，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宋子

①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1年第3卷，第126页。

③ 同上，第197页。

④ 同上，第104—105页。

文，在处理事变方面承担了相当大的责任。蒋介石1月29日曾决定：“宋副院长留驻京沪，所有上海行政人员归宋部长指挥。”^①此外，宋子文还是新成立的外交委员会成员之一。他频繁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除了筹措军费、政费之外，还多次与美英方面洽商解决事变的办法，后来又参与了对日交涉的谋划。

当时，国民党中央所确定的方针是“抵抗”与“交涉”并行，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就是“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②

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初，宋子文多次撰文和公开发表谈话，阐述对淞沪抗战的主张。

宋子文强烈抨击了日本的侵略罪行。他在用英文撰写的《对中国的侵略》一文中，概要介绍了日本入侵上海的经过：1月28日下午1时45分，中方无条件地接受了日方的最后通牒，对此日本领事馆表示非常满意；但是当晚11时45分，日本舰队司令盐泽照会中国当局，要求中国军队撤至上海北部；一个半小时之后，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日军突然进攻闸北，使用大炮、燃烧弹并加上空中攻击。他指出日军这次侵略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据估计，中国平民伤亡达5000多人，许多人死于公共租界之内。有50万居民的闸北，被蓄意焚毁。最野蛮的毁灭文化的行径，是轰炸价值1000万元的商务印书馆，完全毁坏了拥有许多古籍珍本的东方图书馆。”宋子文在这篇文章中赞扬了中国军队抵御日军侵略的英勇气概，并且强调了武力抵抗侵略者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国装备不足的军队第一次无畏地面对日本的强暴，表现出为了独立的事业，我们知道如何去献身。中国的好男儿只拥有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抗击着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军队，正为国家的独立进行神圣的战斗。”^③在另一篇文章《淞沪抗战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431—432页。

② 同上，第431页。

③ *The People's Tribune*（《民众论坛》），第2卷第1—3期合刊，第10—11页。

的意义》中，宋子文指出：“人们从这场战争中，得出可以慰藉的启示，即从根本来看，中国并非无力自卫。中国军队装备简陋，但同日本战争机器进行殊死战斗却士气十足。这史诗般的三十四个昼夜表明，中国士兵能够抗击最强大的外敌，在捍卫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他们知道如何去牺牲。我们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中国男儿不亚于世界上最好的男儿，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但为了捍卫文明古国，我们能够作出任何牺牲……感谢第十九路军及其友军第五军的英雄们，他们使我们懂得，只要我们自己武装起来并加以适当训练，我们完全能够保卫我们神圣的权利和民族的荣誉。”^①宋子文还赞颂了民众对十九路军的大力支持。他在《日本的荒唐概念》一文中指出：“凡有中国平民集居的地方，人们都募捐出大笔钱款以支援第十九路军，给他们食品、衣服和其他物品，许多人甚至到前线为军队运送弹药和装备。”^②

宋子文还公开表示了对国联盟约等国际公约的失望。他以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一再遭受日本侵略的铁的事实，揭示了所谓国际公约的虚幻性。他指出：“我们曾被告知：诸如国联盟约、华盛顿九国公约和巴黎公约等国际公约，完全能够保护弱国免受外来侵略。我们曾寄希望于这些国际公约，天真地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已经被消灭。这一幻想现在已经完全被打破。我们就像如梦初醒，方才知国际公约的效用须以实力为后盾。”他由此而得出中国必须依靠自己力量来求生存的结论。他说：“不管怎样，如果中国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生存，他就必须证明自己的力量，他必须英勇善战！他必须把国防力量置于公共教育、商业、工业、民主原则的公民权等其他一切考虑之上。”^③

如前所述，在九一八事变初期，宋子文同蒋介石等人一样，曾寄希望于国联的仲裁能有效地制止日本对东北的侵略。即使后

① *The People's Tribune* (《民众论坛》)，第2卷第4期，第82—83页。

② 同上，第2卷第1—3期合刊，第37—38页。

③ 同上，第2卷第4期，第82页。

来国联撤兵决议未能奏效，宋子文也只是向有关大国的代表私下表示对国联的不满。与此相关的，为利于尽早平息中日冲突，宋子文甚少公开指责日本的侵略罪行。但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宋子文便迅速、公开和多次表明了对日强硬的观点，甚至指出国联盟约等国际公约在制止侵略方面的不力和无能。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国民政府宣布西迁、大部分中央要员内撤的情况下，宋子文留守京沪并公开发表上述言论，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振奋民心、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也正是从一二八事变之后，无论是国内舆论界、各种政治力量，还是英美等西方国家，甚至日本方面，都把宋子文视作国民党中央政权里的对日强硬派。

当然，宋子文对日本侵犯上海所持的强硬立场，不仅仅表现在口头上和书面文字上。他主动将财政部所辖的税警团调往淞沪前线。也正是在宋子文的紧急要求下，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总顾问魏采尔（G. Wetzell）随德式训练的第八十七师赴淞沪战场，直至3月停战后，魏采尔才回到南京。^①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宋子文及蒋介石等人所说的“抵抗”，确实是要以武力抵御日本军队对上海的进犯。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民政府便在这方面有所部署。1931年10月11日，宋子文便曾向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贝克谈到，中国军队正在长江以北地区集结，日本如在长江流域采取军事行动，将受到中国的制止。^② 与东北地区不同，江浙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当时是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权赖以存在的战略重地，上海更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国民政府在其统治受到日本侵略的直接威胁时，它的对日方针自然要有所调整。

然而，当时包括宋子文在内的国民政府决策者所持的“抵抗”立场，又是有限的、不彻底的，他们仍希望通过“交涉”来解决

^① （美）科尔贝：《德国与中华民国》（W.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斯坦福大学1984年版，第111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1年第3卷，第170页。

事变。不过，这一“交涉”既不单纯是中日之间直接的双边会谈，也不是撇开日本，直接求助于国联。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的“交涉”，就是在英美等大国的介入之下，与日本进行停战会谈。

宋子文虽然对由国联来解决中日冲突的前景颇感失望，但他认为，英美等西方大国在中国，特别是在长江流域，有着重要的利益，不会坐视日本肆意扩张而不顾。他迫切希望和欢迎英美等国介入，以调停中日冲突。1932年1月31日，中日双方的代表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J.F.Brenan）的办公处晤面，美国总领事克宁翰（E.S.Cunningham）也参加了。以后，英方向宋子文提出中日停战及划分“中立区”的办法，明确要求把上海冲突作为局部问题来解决。^①2月2日，英美等国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调停”方案。2月4日，国民政府接受了该方案。宋子文当时虽也同意接受英美等国调停、同日本直接进行交涉，但仍保留着较强硬的态度。他于2月6日向英方明确提出：上海战事“解决之关键在于日本，故当由日本设法停止战祸”，不同意由中方首先单方面撤军。^②当时中国内部有两种意见：（一）先行解决上海问题；（二）应谋得中日问题的全面解决。后一种意见，是顾维钧所力主的，并一度为宋子文等接受。1932年2月7日下午，宋子文同中方参与会谈的人员议定，一面在原则上赞同英国的提议，另一方面要求立即由中国及其有关国家的外交代表开会，讨论中日间所有各项问题，以谋整个解决的途径。^③

但是由于英美的压力，也由于上海商界的迫切要求，急于解决上海事件的国民政府，实际上同意了把东北问题与上海问题分开解决，宋子文也只能按这一方针进行“交涉”。这正是日本所希望的。从3月14日起，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开始进行停战谈判，英、美、法三国公使及意大利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526页。

② 外交委员会会议记录（1932年2月6日），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527页。

驻华使馆代办列席了中日会谈。宋子文没有参加具体谈判，但实际上是中方幕后决策者之一。他同外交部长罗文干、上海市长吴铁城，以及郭泰祺，曾就会谈内容多次同英美方面私下交换意见。在这种场合下，宋子文表示：中方可以作出某些让步，例如以某种方式宣布从浦东地区撤走中国军队；但他强调，停战协定必须规定日军撤离事变中所占领地区的期限，否则中国政府决不会接受这一协定；郭泰祺或是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在这一协定上签字，因为任何签字者都必然会被视作卖国贼。^①宋子文在这里所强调的，正是国民政府在对日交涉中所持的最低限度，即恢复一二八事变前的状态。至于东北大片失陷国土，则无暇顾及了。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正式签字。5月24日，宋子文被国民政府任为淞沪战区善后筹备委员会主席。

三

一二八事变平息后，蒋介石固执“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全力部署反共军事“围剿”。汪精卫称：今后外交方针，唯“求其在我”而已，不能再如往昔之依赖他人。^②汪精卫的潜台词是绕开英美等国，直接与日本达成谅解和妥协。宋子文认为，日本的侵略是对国民党统治最直接、最严重的威胁，必须全力应付；中国只有凭藉英美等西方各国的支持，才能与日本的侵略扩张相抗衡。

1933年热河抗战爆发之后，宋子文与蒋、汪之间在对日方针上的分歧日趋明显。

1933年1月1日，日军向山海关进攻，3日攻陷了山海关和临榆县，然后向热河进犯。这是继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中国再次遭到日本的武装入侵。宋子文从中看到日军向关内大举进犯的

^①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第2辑第10卷，伦敦1964年版，第243—244页。

^② 《大公报》，1932年6月21日。

危险前景。1月11日，他在南京向美国总领事贝克明确表示，对于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不论是在热河、华北或华中，中国政府都将利用所能支配的一切军事力量加以抵抗。^①2月11日，宋子文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抵达北平，与张学良洽商热河抗战的部署，并为张筹措军费。蒋介石当时也已经看出“倭寇攻热在即”，但在兵力部署上，只同意调张作相所部赴热河，不打算派中央军援热拒敌。宋子文经与张学良及其他方面会商后，曾于2月14日电蒋：“弟意政府应以全力对付热河，兄可否出二师为总预备队，以国际情势日人必不向其他区域攻击。”他估计蒋很可能拒绝，便建议调财政部系统的税警团北上：“汉卿请求税警团加入，弟意如中央军一时不能北来，可否开税警一二三团来平，四五团留海州一带……已电请中政会将飞机防空运动暂时停止，以全副精神专注热河防守。”宋并向蒋提出：“热河发生战事时，兄务须放去一切，北平一行。”^②宋子文这里所说的“一切”，当然包括蒋介石当时正在策划的新的“剿共”军事行动。在宋看来，热河战事一旦爆发，必定是两国军队的恶战，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亲自北上，无疑十分必要。但是，蒋介石却以中央军北上会引起华北地方部队的不安和张学良有过不欢迎的态度为由，拒绝了宋子文的建议。他在给宋的复电中称：“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队恐友军多虑，以汉卿前囑伯诚电中，如中央军不加入前不如不来之语，此果为何人之意，其电中并未详明，故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如有必要，则可先派税警队北进也。”蒋并称：“对倭寇近日之处置，以中观测，我方无多顾虑……惟须立催甫忱入热也。”^③可见，蒋介石仅考虑让华北的非中央军抵御日军迫在眉睫的入侵，至于中央军，则是决计不准备投入热河前线的。

宋子文在北平、热河还多次公开演讲，阐释对日问题主张。

^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3年第3卷，第52页。

^{②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594—595页。

他指责日本在抢走东三省后，又不顾世界舆论，“始终的蛮横霸道”，“最近占了榆关，又侵犯热河”。他特别痛斥了日本称满洲为其“生命线”的谬论，指出：“日本人最近印行伪国地图，把热河和东三省划成一个‘满洲国’，叫做他们的‘生命线’。这是什么话，人家的土地可说成我的生命线吗？这是何等的欺侮我们，这是我们何等的耻辱！”^① 宋子文还表示了坚守热河、不向日本侵略者妥协的决心。他说：“热河为中国完整一部，与苏粤各省无异，热河被攻，即同于南京被攻。如日军来攻，则将举全国之力量以与其周旋。日本已占我东北，但任何进一步之进攻，即将予以抵抗。”^② “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领我首都，亦决无人肯作城下之盟也。”^③ 宋子文还呼吁各地各派捐弃成见，团结对外。他指出：“困难危迫，到此地步，非吾辈从容谈话之时，惟有简括一言，愿掬一万分诚意，奉劝全国各界，化除成见，团结一致，努力抗日。”^④ “国难严重，全国一致团结，无分南北。热河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全国国民亦有维护领土之责。”^⑤ 对当时连年不已的西南军阀纷争，宋也指出：“川黔两省事，非一言所能尽。惟当此困难期间，希望皆能化除成见，一致团结，抵御外侮。”^⑥ 显然，在宋子文看来，日本的武装侵略是全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危机，也是对国民党统治的直接威胁，故而应该全力抵御日本入侵。

就在宋子文亲临华北部署热河抗战、呼吁全国团结抗战之际，蒋介石在江西部署新的“剿共”行动的消息，也不时见诸报端。例如，1933年2月17日《大公报》载：蒋介石拟定赣粤桂闽四省“合剿共匪”计划。与蒋的态度对照，宋子文对热河抗战的重视程度远甚于蒋介石。

宋子文在北平向英国公使蓝普森（M.W.Lampson）表明了

①② 《大公报》，1933年2月14日。

③④ 《国闻周报》，第10卷第8期。

⑤ 《大公报》，1933年2月15日。

⑥ 《大公报》，1933年2月14日。

对日方针上的强硬态度。他表示，如果日本进攻热河，中国应从东京召回驻日公使，中国军队将进行抵抗，将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抵抗，时间和世界舆论都对中国有利，中国有足够的条件可以等待。^①这显然表明，宋子文已经估计到中日对峙的长期性了。他还向蓝普森提出：为了自卫，中国可能不得不违背辛丑条约的规定，如果发生这类事情，希望签约各大国谅解。^②可见，宋子文已经考虑到中国开战后利用北宁铁路运兵的问题了。

1933年3月初热河失陷。3月中旬，亲日妥协派的头目汪精卫回国，当月即接手行政院，主持对日外交。此后，蒋介石不顾长城一线中日战事正在进行，仍在江西指挥“剿共”军事。4月中旬至8月，宋子文出访美国和欧洲各国，他一方面出席华盛顿经济讨论会和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一方面利用这次出访的机会，向欧美各国谋求财政经济上的援助，呼吁各国采取共同措施，遏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宋子文的根本方针是：“联合欧美、抵御日本。”

在宋子文出访欧美期间，蒋介石与汪精卫配合默契，“安内”与“和日”并行。他们采取了几项大的措施：（一）于1933年5月31日同日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二）6月15日，蒋介石命令坚决抗日的第十九路军撤出上海；（三）7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将华北军队除一部分留驻外，其余悉皆南调，向江西集中，准备向红军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四）8月17日，免去主张对日强硬的外交部长罗文干职务，由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数日后，外交部次长刘崇杰亦被免职，由汪的亲信唐有壬出任外交部次长。时任驻法公使的顾维钧曾评论汪、唐出长外交：“这给我的印象是，政府可能今后在外交上致力于与日妥协。”^③显然，妥协退让已成为国民政府的对日

①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2辑第11卷，伦敦1970年版，第339页。

② 同上第348页。

③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0页。

基本方针，这个方针同宋子文对日强硬的主张发生了冲突。

1933年8月底宋子文回国后，曾在南京对记者谈到：外交方针，中央早有一贯之政策，予为政府委员之一，当然不能特具主张。不过盱衡大势，当以自强不息奉为圭臬。^①9月上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庐山举行，宋子文在会议上提出为持久抗日而迅速准备的积极政策，包括在经济上政治上抵抗日本，外交上推动国际一致行动，实现国内政治团结，制订国防计划，建立基础工业，发展全国战略运输网。^②这一方案，是宋子文在伦敦出席世界经济会议期间，同顾维钧、郭泰祺（驻英公使）、颜惠庆（驻苏大使）一起磋商议定的。但是，宋子文对日强硬的主张被会议否定了。庐山会议结束后，国民党官方向新闻界表示，会议确定应付日本的方针为：除割让东三省、热河和承认伪国为绝对不可能外，对其他次要问题，仍应与之作相当周旋，并极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感情之行动及言论。^③

不久，驻日公使蒋作宾重返日本，并向日方表示：中国政府已在庐山会议中决定对日方针，本人为期使中日关系恢复常态而返任。^④

庐山会议之后，宋子文并未放弃对日强硬的立场。10月3日，他向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贝克谈到：那些主张中国应对日本采取“现实主义”政策的人，忘记了以下基本事实，即日本对已经得到的东西永远不会满足，日本已决心使中国屈服，正在推行进一步扩张的缜密计划，其步骤之一，就是把华北从中国本土脱离出来，其方式将与满洲已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不能回避这一事实。宋子文还承认，国民政府内部在对日政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0页。

② 《申报》，1933年9月2日。

③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248—249页。

④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9辑，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159页。

策方面存在着对立的观点。^①此外,宋子文还电告顾维钧:庐山会议上,“外交政策由于意见分歧,暂定为避免与日本冲突的完全消极之政策,但利用敌人之压力以中间人自居而图培植势力者,颇不乏其人”。^②1933年10月底,宋子文被迫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此后,国民党中央领导层内部对日妥协的主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占了上风。直到1935年的华北危机之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才逐步转向强硬,宋子文原先倡行的“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方针才得以重新贯彻实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对日方针,由中日直接交涉转为诉诸国际联盟,在一二八事变期间,又改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这两个阶段,宋子文的对日态度已有转趋强硬的表现,但同蒋介石、汪精卫尚未有重大分歧。一二八事变后至1933年热河抗战,宋子文已成为国民党对日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并同蒋介石、汪精卫的对日主张发生重大分歧。宋子文对日态度的变化,表明了日本侵华政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危及了国民党的统治,特别是给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带来了重大威胁;国民党营垒中的某些有识之士,以及那些同英美有较密切联系的官员,已开始认识到必须在对日方针上改弦更张,重定国是。但是,从整体而言,以宋子文为代表的对日强硬派并未取得主导地位。特别是1933年热河抗战失败后,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同对日妥协派的头目汪精卫合流,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遂处于抗日战争爆发前最为消极的阶段了。

宋子文对日强硬的主张受挫,蒋介石汪精卫的对日妥协退让方针居主导地位,这一结局,又与当时各大国在远东外交格局上的地位和作用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在对日与对英美方面,起先并无明显的倾向性。以后,日本逐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9辑,第159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3年第3卷,第420页。

的政策，对中国内部事务表现出了强烈的介入意向，英美却主要关注于欧洲事务和应付国内问题，没有对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主动、积极的扶植，与国民党政权还没有建立起很密切的经济、政治上的联系。国民政府中所谓“欧美派”的代表宋子文，也只是刚开始推出“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方针。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无论国际联盟还是英美等大国，都没有为制止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径而采取任何积极有效的措施。这样，推行消极的远东政策的英美，与奉行积极的侵略扩张政策的日本相比，前者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显然远为逊色。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坚持强硬的对日方针，自然会遭到挫折。

当然，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对日方针的演变，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还有待于学术界作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作出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科学的阐释。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